

周煦良自述

我于 1905 年 8 月生于一个前清大官僚家庭。十五岁以前都是读的家塾，三岁起识字，识完商务印书馆的一千张背面有画图的白纸字块后，又认了各种颜色纸的字块二千字。毛笔字先由老师把着手教写，慢慢再自己写。读书先读三字经，然后是“四书”；但同时也读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科书，其第一课是《天地日月山水土木》，仍是从识字开始，但是读到第四册，已经有了知了在夏天歌唱、冬天饥饿、向蚂蚁乞食的寓言。蚂蚁责备知了，问它夏天干什么来，最后一句话是“胡言饥？”多年后，找到林纾译的《伊索寓言》时，才发现我幼时读的那段寓言竟是林译的，不禁佩服“商务”选材之精。

我十二岁起读英文。一直到进大同中学之前，换了好几位老师，第一位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，第二位是香港大学毕业的，第三位是胡敦复的堂弟胡宪生，第四位是胡敦复的嫡弟胡刚复，第五位是刚复先生留美的同学薛锦琴先生。薛先生的中文非常之好，我们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现她的两首金缕曲。她在我家教英语最久。我十五岁进大同中学后，薛先生还教我的弟妹。

大同中学最初叫大同学院，但当时只叫大同学院，一直到大学班开设时，才改称大同大学。我父亲周达和胡敦复、胡明复弟兄筹备成立中国科学社，大约也捐赠了一笔经

费，所以成立后和南通张謇一同被推为名誉会长（任鸿隽是会长）。由于有这些交情，我和我哥哥进大同学院都没有经过考试。记得入学时，老师问我数学读过什么，我说读过算术（是自修的），就让我读几何和代数，英文则是读盖斯盖尔夫人的《克兰福德》，对我来说实在是深了一点。

大同是个重理轻文的学校，英语课教学目的主要是培养阅读能力，任课的教师是胡宪生，最着重分析句子成分，或者口问，或者叫我们上黑板上作图解。三年下来，我的阅读能力是掌握了，但是，口语比起我在中西女塾读书的几个妹妹来，都要差，而且由于学校重理轻文，我在中学毕业后就选了化学专业。五卅运动时，我起来反对学校那种要学生埋头读书的风气，反对学校当局的“学术救国”的口号，而代之以蔡元培提出的“读书不忘救国，救国不忘读书”的口号。我父亲得知我在学校闹事，很恼火，将我禁闭在家。我说我要读书，他问我要读什么，我不好要一个化学实验室，只好说我要学微积分，因为我吃够了不懂微积分而读力学之苦，他为我请了何鲁先生，当时最有名的数学家。何先生谈风极健，上完课后，燃上一枝烟，便畅谈天下事来。有一次他跟我说，做一个中国人而不读《资治通鉴》是不行的。我其实在家塾已经读过纲鉴，但听了他的话，便立刻把家里四部丛刊中的《资治通鉴》取出来读。我父亲看了，怕我损坏，只好另外替我买了一部毛边纸本的，并另外给我配了一只盒子。何先生给我打的微积分底子，使我四年后弃理修文，赴爱丁堡留学，攻读文科硕士的。能够跳过文科硕士要求的两年数学课，而径读理科的第三学年数学，并且成绩优等。但是，终由于性情不在数学，在这方面始终没有钻研下去。

我搞翻译最初是为了学习，那是在回国后的第三年，即

1934 年，在前一年冬我参加福建人民政府，后来流亡香港数月返沪，无事可做，便想闭门读书。我读的硕士主要以哲学、心理学为主，为了想了解当代物理对哲学的冲击，我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，但觉得不够，为了进一步了解，便想把一本通俗的著作《神秘的宇宙》译出来。这书是英国天体物理学权威秦司写的。秦司是第一个提出太阳的自转只能产生双星系，而现在有行星环绕的太阳系则是由于有另一个恒星经过太阳附近，在太阳表面拉出巨大的浪潮，从而洒出几滴浪花，这些浪花从此便形成我们看见的行星系。秦司的理论是，由于两颗恒星相互接近的机会极少，在亿兆个太阳里，恐怕只有一个像太阳这样拥有行星系，因此我们人类在宇宙间是极端孤独的。

书译成后，我的老同学碰巧认识在开明书店任编辑的顾均正，他看了同意收在他们青年丛书里。到了下半年，我赴京住在四妹家时，书店来信索我写一篇序言，这可把我难住了，所幸我是个闲人，于是天天跑北京图书馆，连海森堡的书都借来看了。时间花了三个月，写了一篇八千字的序文，什么波力学量子论、测不准原理（当时我译非决定论）、熵（当时我译死热），总算能讲一点了，这在我就算达到目的。

在北京呆的一年时间对我是个转折点。我本来想认真翻译一部英国哲学家的书，我选了贝克莱，因为洛克、休谟都有人译了，贝克莱的哲学太幼稚，无人顾及，我便想拿他开刀。在北京时我把自己译的《神秘的宇宙》寄了一本给我父亲，被他来信骂了一阵，说有些句子简直像外国话。后来我得知他在集邮杂志上写的白话文完全是“五四”以前的白话，但我当时还是接受了他的意见。在译贝克莱时，我定下一个假设，不管句子多长，中文一定能表达出来。这个决心下得很好，使我的表达能力加强了！但是我当时下的一个假设，即凡是外文能表达

得了的意思，中文一定也能表达得了。这个假设后来却不断受到挑战，因为这里牵涉到一个意译和直译的问题。

我的贝克莱进行得很慢，一晚只能译二三页，我也不急，反正有的是时间。但是交往的朋友多起来了，有旧识，有新友，而以搞文学的居多，我的兴趣也转移到文学方面。所以次年夏、秋回到南方，在暨南大学教书，也教起英国文学课来，哲学翻译基本上放弃了。

在暨南大学教书的两年（1935—1937），我译了些现代英国文学论文和诗歌。译论文虽然是应《新诗》月刊的要求，主要还是为了学习，如艾略特的《诗的用处与批评的用处》叙论、叶芝的《牛津现代诗选序》、加劳德的《诗的研究》。我想弄清楚英文现代诗的情况，译诗则是为了试验建立中国新诗的格律。那时我也写新诗。写诗靠灵感，虽不是一挥而就，但至多也只能两三天，再多就写不成了。译诗则不然，尽可以五日一水、十日一石，尽情琢磨，非到满意不肯放手。虽说如此，我对自己译的几首华兹华斯仍不满意，觉得不能表现他那种平淡风格。后来译霍思曼的《希罗普郡少年》，这才找到合适的题材，还因为那时已是 1937 年初，我对怎样建立中国新诗格律已形成自己的见解，翻译不是为了学习，而是为了进行试验了。《希罗普郡少年》一共是六十三首。开头在《新诗》上发表了七首，后来又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了十三首。我想一鼓作气在年终译完它，但是抗日战争爆发，这个计划当然也告吹。

那年秋天，我本来已经应聘燕京大学，现在北上既不可能，就西上到汉口，到成都，到峨眉山，再折返成都，而重庆，而香港，而上海。后来又由上海迁居扬州。及到 1945 年抗日胜利时，我已经由一个独身青年成为一个有家室的中年人了。但是，抗日战争八年中，那本《希罗普郡少年》都一直放

在身边，并且断断续续地在译着，一直到 1948 年底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方才完成全集的翻译和注释。

任何搞翻译的人都有其学徒阶段，翻译《希罗普郡少年》为我完成了我的学徒阶段，使我学会了为适应格律而改变句子的结构和另外造句，懂得以文言入诗、以外语结构入诗的不可避免性，懂得了汉语同义词的丰富和自己词汇的贫乏，懂得了自己虽然是中国人，但是掌握本国语言的能力远不够翻译的要求，从而对汉语语法也留意起来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果 1937 到 1945 这八年中我译的不是霍思曼的诗而是贝克莱的哲学，或者一部小说，收获绝没有这样大。

我没有计算一首诗的翻译需要多久，只记得有一首十二行的诗译了一个星期，另一首三十二行的诗译了一个月；这些诗到译成之后，原诗和译诗都能背诵如流了。记得在成都时，文协在罗念生先生家开晚会，有人朗诵新诗，我即席朗诵一首《希罗普郡少年》中的《某木匠子》，是四行七节，先诵原诗，后诵译诗，那天因受寒喉咙作哑，但效果自认为很好。1945 年冬上海文协成立，郑振铎主持，朱维基朗诵诗时忽然眼睛花了，朗诵不下去，退下。振铎先生要我朗诵一首，我便朗诵上面提到的那首三十二行的诗。我不大懂得，为什么自己译的诗还要捧着本子读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有人连自己写的诗朗诵时，也要照着本子读。岂非怪事！

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我一面同傅雷主编《新语》半月刊，一面任光华大学外文系主任。《新语》办了五期就停刊，光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则因我在 1947 年春天公开支持校内学生的反内战、反饥饿运动，在暑假被学校解聘，赴武汉大学任教，直到 1949 年 2 月因父亲逝世方才奔丧返沪。但是在 1945 至 1947 这两年中，我却翻译了两部小说，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

做过的。

我对英国文学的兴趣主要在诗歌方面。小说只拣自己喜欢的看，不管名头大小，通俗的也看；侦探小说、探险小说、神秘小说，这些我从小被翻译小说所引起的兴趣，长大后并未稍减。这次译的两部小说，一部叫《地球末日记》，叙述天外来了两颗星，进入太阳系，甲星将要把地球撞掉，乙星则是和地球一样的人类可以居住的行星。地球上的科学家得知后，决定成立末日委员会，预备造一个容纳一百人的宇宙飞船，把最优秀的人类和人类成就载往乙星，延续人种。书是 30 年代作品，反映美国当时的社会情况，也伸张了人类的理想。另一部是《珍妮的肖像》，美国罗勃特耐珊的一个中篇幻想爱情小说。前者以情节引人入胜，后者则是以优美的抒情文笔吸引了我。两书的翻译纯粹是从爱好出发的。《地球末日记》由龙门书局出版；《珍妮的肖像》则一直放在抽屉里睡觉，直到 1980 年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，距译成的时间已经三十多年。这两部书我至今仍很喜欢。在《地球末日记》中，有几章如甲星第一次经过地球附近、在地球表面造成巨大破坏，如人类永远离开地球、出发和途中亲眼看见地球毁灭和抵达新行星的那几章，自己译得相当得意，后来高兴时还拿出来重读一遍。《珍妮的肖像》则被用来作为我教翻译课时英汉对照的教材。

《地球末日记》出版后，我送了一本给我父亲，他没有再骂。但拿我自己来说，这部小说却使我受到一次教训，因为后来我发现书中提到的两个星座早已有了译名，而我只是音译，还有“法国式窗户”是“落地窗”之误。从这些错误，我认识到：（一）工具书应当多备，而我连一部综合大辞典都没有，当然不知道这些星座的译名。（二）误译总是由于自己不懂而自以为懂时才产生，如果虚心一点，或者心细一点，至多译不出而

请教高明，总不至于译错。

前面讲过，我约摸在这个时期完成了我的翻译学徒阶段。这不仅从我比较胜任愉快地译了两部小说上看出来，而且从我审阅这时期以前的译稿上也看出来。举例说，我为《新诗》译的英国加劳德的《诗的研究》第一讲，后来在武汉大学找出来打算作为英汉对照的教材用时，就发现质量很差，几乎要重译过。

顺带想在这里谈一下我是怎样教英汉翻译课的。我把每星期三小时的课分为这样三个部分，一小时讲翻译理论，一小时讲英汉对照读物，一小时把学生练习的错误综合为几个重点讲述一下。但是我教翻译课的时间不长，在武大一年半就奔父丧返沪。解放后重返光华，又教了两年。光华合并为华东师大后，我才教了半年，英语专业就取消了。后来虽然恢复，但是翻译是高年级课，轮不到开课，我就调动工作了。

全国解放以后，翻译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。我虽然不是专业翻译家，却也翻译了比以往更多的文艺作品。我们在文协（即后来的作协）的翻译小组就出了两本苏联短篇小说集，都是由我总校和写序言的；其中《一个学童的日记》的序言自觉写得颇为得意，因为它把毫无关系的十来个中短篇小说，信手拈来地串在一起成为一篇文章。这个文章诀窍是我从英国《摄影年鉴》（Photogram of the Year）主编的前言学来的。我年轻时对摄影很迷，还有一张雪景在爱丁堡展出过。

除了这两本集体翻译外，我还译了法捷耶夫的《封锁期间的列宁格勒》、《金羊毛的国土》、《活命的水》等苏联报道文学和小说——当然都是从英文转译的。由于国民党过去对苏联文学的抵制，人们对新译的苏联文艺作品如饥似渴地抢着看，从英文转译的也照受欢迎。小国家的文学更是如此，如波兰、捷克

等等。欧美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了。我翻译英国高尔斯华绥的《福尔赛世家》三部曲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——50 年代中期——开始的。高尔斯华绥的文笔凝练，比那些转译的作品译起来要吃力得多；当然，和译诗还不能比。为了弄清伦敦的地理，我买了伦敦游览指南，还买了巴黎游览指南、欧洲游览指南；而且宁可旧的，不要新的。指南上常有关于城市沿革的说明，使人知道一些路名的由来。这三部曲共八十万字，前后花了我三年时间。其实每一本译起来三个月尽够了，但是忙、懒，和其他兴趣的吸引，使我完成一部之后，总要搁好久才动笔。

1958 年后，我由华东师大调至上海社联主持一个介绍资本主义国家哲学、社会科学情况的刊物，名称叫《文摘》，分论文、学派与人物介绍、书译、学会活动、简讯等栏，每月六万字。从 9 月试刊起，一直到 1966 年 4 月止，始终没有间断过，编排的格式也没有变动过。编辑部的人开始不到十个，后来也没有增加多少。开头没有一个人心中有数的，包括我在内。组稿的对象大都是上海各大学、社科院和出版社这方面的内行；经过了一个时期之后，我们的编辑自己也动手翻译了。我在《文摘》的工作包括选稿、审稿、译稿和改稿。改稿的对象多数是编辑室人员，碰到一些典型的错误，我就会跑到隔壁的大房间里朝书桌一坐，不是单单对译者，而是对大家，讲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和解决的办法。举例说，有一句译者指出这句是引文后，我就从书柜里取出 Bartlett 的引文词典，当场查给他看，果然一查就查到了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一句在日常生活中常用语被译者当做理论文看待，当然也完全搞错了；于是我又跑过去向译者指出，并劝他有空时也得看看非专业的书，如小说、戏剧之类。另有一些稿子，则除了改正以外，还在边纸

注出改动的理由。当然这样做都是为了提高编辑人员的水平。对外来稿，如果改动得太多，以后便不再约稿了。

杂志的销路并不高，两三千份光景，但是订户是相当重视的。上海图书馆特别给我们方便，每星期四我们去时，新到的杂志都尽先拿给我们看。工作上了轨道之后，我便盘算第二步怎么办。我们的目的是向学术界提供学术情报，不是仅仅办一个杂志就算完的。我觉得要办好这项工作需要做两件事：（一）出文摘丛书；（二）出文摘文存。

文摘丛书的目的是将一本书的精华摘译为一本小书，或将一本有代表性的小书全译过来。第一部是从巴斯摩尔的《哲学百年》中把涉及逻辑的部分摘译为一本《近代逻辑发展纲要》，从密勒到维特根斯坦都包括了，共十万字，由我一人译出，请师大两位教授校一下，就出版了。第二部是《逻辑史》，取材于大英百科全书。我担任古代和近代部分，师大徐怀启教授担任中世纪部分。书译成后，只印了部油印稿但找不到出版社。现在连油印稿也被人拿去不还我了。文摘文存的打算是将《文摘》中发表过的重要论文全文译出，印单行本并编号，仅供有关单位购买，估计每册约二万到四万字。如果积累到上百篇，也就停排。那位替我们译了全文的同志，由于没有刊印，我们连稿费都没有致送。

在译完《福尔赛世家》三部曲之后的十几年中，我译的几乎都是哲学、社会科学之类，其中有配合当时学术争论的包山葵的《美学三讲》，伽俐略的《哥白尼和托勒密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》，是毛主席点出要译的，全书共四十万字，由另一人译，我校。原书虽则从意大利文转译，但句子特别长。我对拆长句已经很习惯了，但有时仍不得不先用另一张打草稿，然后把全句的译文录在稿纸上。接着又和全增嘏、傅季重、胡寄南

等合译一部英国梅林写的自然科学史，由我总校（当然有些专门名词的定名还得请教专家），这部书我译和校都干得很高兴，因为等于系统地学习了一遍自然科学发展史。

但是文学翻译和我也没有绝缘，因为在 60 年代初，教育部召开全国大学文科教材会议，我被指定为《外国文学作品选》的主编。教材包括从古到今，从东方到西方。译文全部白话，“五四”以前的不取，因此林译小说和苏曼殊的译诗都割爱了，但朱湘译的沙恭仍选用了一首。也不一定非是根据原文的译本不可。傅东华译的荷马、我译的维吉尔的伊尼德都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。这部书在十年动乱后又修订了一次，将二次大战前已故的作家也包括进去。

现在即将出版的英国小说家毛姆的《刀锋》恐怕是我最后译的一部长篇小说了。由于健康关系，以后即使迫不得已，也只打算译点散文或论文，长篇巨著原来和出版社约定的，都已退约。倒是几十年来积累的翻译经验，过去虽然总结了一些，但还有许多没有写成文章。这些经验的总结，可以使后进的翻译家少走些弯路。这些还打算写下去。

最近湖南人民出版社已同意将我译的《希罗普郡少年》收在《译诗丛书》中出版，为此，我将译文和注释重新校订了一次，并写了一篇近二万字的长序。经历了万水千山，这部译诗终于能和世人见面，使我心里感到高兴，同时感觉得以这部书的出版来结束我的翻译生活是再适合没有了。

*　　*　　*

周煦良自传只写了他的翻译生涯，后因健康恶化，而终止了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经历的写作。他已在 1984 年 1 月 22 日逝世，已经没有可能完成他的自传了。

周煦良先生是“优秀的社会科学工作者”，他在社会科学

战线上奋斗了一生，在社会科学的翻译和研究方面都有卓越贡献。

周煦良先生安徽至德（现并为东至县）人。曾用笔名舟斋、贺若壁、文木。1920 年起在上海大同学院读中学、大学。 1926 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， 1928 年春赴英国留学，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哲学、心理学和文学， 1932 年获文科硕士学位。同年，参加蔡廷锴将军发起的福建人民政府反蒋抗日斗争，失败后流亡香港。 1934 年由港返沪，翻译了英国天体物理学家秦司的通俗著作《神密的宇宙》，后由开明书店收入《青年丛书》出版。 1935 年应郑振铎邀请到暨南大学英文系任教。1938 年到四川大学英语系任副教授。 1945 年在上海与傅雷合办《新语》半月刊，与施蛰存合编《活时代》，并出任光华大学英文系主任。 1947 年参加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，因在反内战宣言上署名，被校方解聘，后应武汉大学之聘任外文系教授。1949 年重返光华大学任英文系主任。 1951 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。 1958 年调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，任《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》月刊副主编。 1962 年起任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和上海文联副秘书长。还担任上海外文学会副会长。还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顾问、民进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、上海市政协常委。

现在仅补充这一些，更深地对周先生的研究和评价只好留待以后了。

（方治）

主要著述目录：

地球末日记（美）巴马·威理著　上海龙门联合书局　1947 年

活命的水（苏）考塞夫臬考夫著　中华书局　1951 年

金羊毛的国土（苏）保斯托夫斯基著　春明书店　1952 年
理性的眼睛（德）史第芬·海姆著　平明出版社　1954 年
封锁期间的列宁格勒（苏）法捷耶夫著　上海出版公司　1952 年
福尔赛世家（英）高尔斯华绥著　第一部《有产业的人》新文艺出版社
1958 年第二部《骑虎》上海文艺出版社　1961 年第三部《出租》
上海文艺出版社　1963 年
刀锋（英）毛姆著　上海译文出版社　1981—1983 年
珍妮的肖像（美）劳伯特·耐珊著　江苏人民出版社　1979 年
希罗普郡少年（英）霍旦曼著　湖南人民出版社　1983 年
纪念霍旦曼诞生 120 周年　译林　1979 年
诗的用处与批评的用处（艾略特）
牛津现代诗选序（叶芝）
诗的研究（加劳德）
关于（长恨歌）的通信（与俞平伯）《晋阳学刊》　1981 年 6月
何妨对答李宗为先生（长恨歌）重新评价《晋阳学刊》　1984 年 4月

（周煦良先生已于 1984 年 1 月 22 日逝世）



蔡尚思自述

我曾自号中睿，因很爱我母郭氏，尤为她的被父等压迫抱不平，故曾用“郭生”为笔名。我生于 1905 年 11 月 10 日，福建德化人。传闻近祖由农而商，父破落户，为塾师。我上有兄，下有弟妹，多死于鼠疫。弟为乞丐，饿死。母是城市贫民，只活到四十岁，她一死，我便觉得这个家不复存在了。

一、打下劳动、学问两个基础时期——1925 年以前

我少时赤足在农村养鸭牧羊，好爬山，多走路，刈芒砍柴，挑担种菜，对农事颇熟悉，有了农业常识和劳动基础。初进私塾，读儒家经书；后人县城小学，因路太远，疲劳不堪，考试常不及格。1921 年起去永春入旧制中学。诗人郑翘松藏书颇富，我经常去借书，自动拼命苦读，多次死去活来，也就名列前茅了。我钻研中国学术，如先秦诸子、《史记》、唐宋八家等等，尤其是韩文 后来张恨水、梅光羲等都指出这一点。我把写作集成《少时文稿》，这样就打好了做学问的基础。每寒暑假回家，虽仍参加劳动，却已越来越少，终于中断了。

内地礼教空气浓厚，我少时因被拉去拜“天公”，而发问：“有天公就有地婆，为什么没有拜地婆？”又如晒裤子、足布等，男的可

挂在人行道的上头，女的高度只能在腰以下，又必在偏僻的地方。我只看见丈夫打妻、纳妾、续弦，心中感到有些奇怪。内地宗族观念也牢不可破，有些姓蔡的自以为是蔡襄的后裔，曾推举代表致祭聚餐，我独不以为然而说：“我们也许是蔡京蔡汴的后裔。我们自己不争气，而老是要借同宗先贤的光，便是最不肖的子孙。我们好不好，同祖先的贤不贤根本没有关系。祖先贤同我们无益，祖先不贤同我们无损；何况姓名只是一种便于识别的符号，而绝不是本来事实。以我为例，生我者父母，他俩是异姓同居，我可以姓蔡，也可以姓郭。推上去，恐怕有些人把许多姓都姓到了。不仅如此，富人买子，贫人卖子以及招赘，男子出嫁，均改易姓名，是连‘家谱’、‘族谱’也靠不住了。”我竟被他们斥为“妖怪”。我尽管想到这些问题，但仍笃信孔子而未提及韩愈、朱熹等，没有想到二者原来是关联的一个问题。

二、求师最急、生活最苦和读书最多时期
——1925 到 1935 年

我不顾邑中一些父老的劝阻和恐吓，敢于驳斥“半路死论”、“地理命定论”等荒谬理由，死也要到北京去求名师。家中迫不得已，多方筹到数目有限的路费。初次只身北上，因来不及投考清华学校研究院，改考孔教大学研究科、北京大学研究所为研究生。因无钱住公寓，只好住在永春会馆里，一面自由去北大听课和听京中名教授做学术报告，一面去北大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读书。我曾上清华研究院、北大研究所诸名师书，内容主要是说：

居常自恨，生于遐陬，既寡师友之观摩，又乏书籍之浸灌，故欲乘此时机，脱蓰危邦，远离陋俗，专心致志，求诸通都广邑之中，与夫名山大川之间，有道通古今，学博中外，以承先启后为怀，以经世诱民为任，真足为师资者而亲炙之……且遍交当世有识之士，尽读历代有用之书，以辅其德，扩其识，他时道通学成之后，得效涓埃以报国家，或垂简策以资后学，尚不愧于先圣，有裨于世人，不致行尸世上，蠹食宇内，以羞炎黄之裔，而为夷獠所笑，则虽槁萎于蓬蒿之间，腐化于鸟鸢之腹，亦足以了其愿，而瞑其目矣……遂不远数千里而来，敢以不肖之身，为诸先生之累；第未知樗栎之材，果不见弃于大匠之门哉？

此书最足以见我北来的志愿，所以王国维、陈垣、朱希祖、江瀚、梅光羲、李翊灼等一见面就称道我这封信。尤其是陈垣总是记住这封信，到 30 年代还要我去辅仁大学教文史课。我一到北京，即到清华研究院去拜王国维、梁启超为师。既和王氏畅谈，又寄旧作《文稿》请他指正，他复书勉励我道：

前日枉顾，便知足下志趣不凡；昨日接手书，并读文稿，如《陈玄传》等，具有思致笔力，亦能达其所欲言，甚为欣喜！年少力富，来日正长，固不可自馁，亦不可以此自限。

我问治经，他复书指示说：

弟意可先读《毛诗》注疏， 参考《说文》段注及《经义述闻》,再及《礼疏》 否则,精读《史》、《汉》亦佳。

同年，我把到京才草成的《论各家思想》一稿寄请梁启超指教，他也复书郑重勉励我说：

大稿略读，具见精思，更加覃究，当可成一家言，勉旃 勉旃！

这在我是得到一次意外的鼓舞，我决定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，就从此正式开始了。

我本曾抱实学主义，不抱文凭主义，对学者只看学力不看资格，不想专读一个学校；只是由于得悉北大研究所以学术民主、研究自由著称，是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机构之一，才投考进去。当时导师中最常和我接谈的，有史学组的陈垣、朱希祖等，文学组的江瀚等，西洋哲学方面的陈大齐等，佛学方面的梅光羲、李翊灼等。陈垣深盼我学到顾炎武的考据文章，而认欧阳修是文人不配作史。李氏因我研究孔子哲学而告诫我要做一个“今之孔子”，谓“若一切皆本之孔子，此古之孔子，非吾之所以望子也”。我得到启发，就逐渐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了。梅氏经常从天津来北京讲学，到我住的会馆，论儒佛问题，多次勉励我精研佛学。我很后悔，没有乘此难得的机会，更多地从他学到佛学。承以上诸师的鼓励，我永记在心中。我在京求学时期，曾写出关于孔、老、墨哲学的几种稿子。

我参加 1926 年“三一八”学生群众向北洋军阀段祺瑞示威游行，亲眼看见反动政府的野蛮屠杀学生，真是气极了！

由于家中破产，接济中断，我在京绝粮，除了应《世界日报》的征求，把《文稿》寄给发表，得到张恨水的好评和稿费以外，只好向在京津求学的闽南同乡几角几元的零星借钱，在

最穷困的时候，曾经一天只吃一个馒头，自己也无法预知会在哪一天饿死，失眠胃病都从此开始了。这是我生平尝到饥饿滋味的第一次，我也才真正体会到历史上记载的和劳动人民受过的饥饿之苦。这是我在反动统治下生活的另一种气愤不平。

因此，不得不于 1928 年暑后南下谋生，结果不仅没有就业机会，而且第一次听见南京官场的种种黑幕，更加气愤不平。于是大反封建传统思想，写出《伦理革命》一书，企图根本打破社会上一切不平等事，推翻孔、佛各家及许多近人如康有为、张竞生等的片面说教，欲以“大人伦观”改易“小人伦观”，不但空想，而且很左。蔡元培后来也有书给我说：“当局将有以为未便与青年道之者。”我这时由于老是挨饿，对旧社会的一切极端不满，但又还没有多读马克思主义著作，没有接触到共产党人，所以只能成为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。

1929 年秋，蔡元培介绍我到上海大夏大学任讲师。次年曾向章太炎、李石岑、太虚等请教，他们都很爽快地发表了不少特别的见解。又次年秋，蔡元培介绍我任复旦大学教授。我到此二校，才体会到教师被学店老板剥削的痛苦，失业近半年又过着困苦的生活。 1931 年去武昌华中大学任教。 1932 年，由蔡元培等介绍我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。

我在华中大学三年，一直秘密与同学何伟（霍恒德）等开始研究马列主义理论，如有新书，便互相介绍和借阅。我曾把数年中所采购阅读的新哲学新社会科学书百种分铺在地板上，互相对比加以摘录，其目的在便于自己记忆，因此草成表解多种，而其中尤以社会思想表解用力最多。经此次作表解后，在认识上逐渐正确起来，这是生平研究西洋近代新学很值得纪念的一个时期。这样，我的思想也就开始转变为信仰科学社会主义，反对空想社会主义了。